

微信空间纠结：一种松绑之后的无序喷发

每个人的微信生活是什么样的？腾讯用《2016微信数据报告》给出了一份图景：9月微信日平均登录用户已超7亿，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35%。而全年一半用户每天使用微信时长超过90分钟，其中，年轻人爱晒朋友圈，老年人爱转鸡汤文。

无论将其作为一种媒介，还是作为一种社交平台，诞生了5年的微信都已经超出联通工具的范畴，而负载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内涵。它加速了人们知识获取方式的革新，改变了社交路径和习惯，使“媒体”的定义发生变形，更将

公共议事平台进一步迁移到虚拟空间。早在新世纪之初，著名学者黄万盛就曾指出，网络社群正在解构现实社群及其组织生活方式。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尾，北大胡泳教授又在其著作《众声喧哗》中讨论了一个变化：通过新的“共有媒体”的作用，传统的“公域”和“私域”都发生了易位。现在，微信的出现和成熟，将这一切变得更加确定无疑，也呈现出更多待解的“纠结”。

比如，微信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，又使得公共讨论规则难以形成共识。社交工具的翻新速度，却远远超过

了公共讨论规则的成型速度。或者说，这种迅速喷涌出的讨论热情和刚刚摆脱“现实规则”的快感，让人们不愿意受制于任何框架，以至于近年来，遵循什么规则来辩论，也成了公共辩论的常见议题。如胡泳教授所言，“共有媒体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”，但这种力量要成型，显然还要经过漫长的多元碰撞和反复角力。

再比如，微信既助推了个体话语的自由和话语权的平等，又使得这种站队和撕裂变得更频繁、更加低成本。在“人贩子死刑”讨论中，在“罗一笑捐

款”事件中，甚至在“《一代宗师》值不值得看”的争议中，好友反目、互撕和拉黑已经成为标配。

也许是因为微信空间解开了现实生活对国人的“规训”，也许是因为它部分破除了知识供给和道德评判的垄断，其所展现出的纠结，正是一种松绑之后的无序喷发。对中国社会，互联网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影响可能比技术意义上的影响更大，我们每一个使用微信的普通人会在未来更加深切的感知到。

《京华时报》2016.12.30文/刘文嘉

科研管理应该摈弃“短视思维”

有学者云：很多时候，我们被淘汰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，也不是因为技术或者外部环境，而是旧思维使然。对于科研管理而言，尤其应摈弃“短视思维”，多些长远眼光。

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尽人皆知，资助瓦特的两位企业家——约翰·罗巴克和马修·博尔顿却很少有人注意。煤矿主罗巴克帮瓦特偿还债务，并且提供经费支持瓦特开展蒸汽机研究。当财务恶化导致罗巴克破产，博尔顿及时伸出援手，瓦特终于成功改良蒸汽机，将人类文明带入蒸汽时代。着眼长远、立足创新，不被当前市场和利润左右，往往能涵养重大发明创新。

陈景润年轻时曾靠摆书摊维持生

计。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知悉后惊叹“浪费人才”，将陈景润调入厦门大学，还多次关心他的工作和科研。陈景润初露锋芒后，华罗庚想调他去中科院数学所，王亚南不为厦门大学局部利益所囿，坚决支持。后来陈景润攻克了“哥德巴赫猜想”中“1+2”难题，成就中国数学界的一段传奇。做科学家的守护人，默默为“天才”培土施肥，科学往往就会孕育惊人的创造。

那些“短视思维”，往往就是只看眼前、不看长远，只关心省钱、不关心效果，安于现状、看不到危机，等等。有的科研立项片面追求用时短、花钱少，结果“浅水区拥挤不堪，深水区无人问津”，应用类学科因见效快越来越热，基

础研究因见效缓慢而成薄弱环节，“创新”矮化成了修修补补、步人后尘。事实上，原创性成果诞生时常面临不理想的市场环境考验，是否能顶住世俗压力挺“先驱”“前瞻”，往往就取决于能不能摈弃“短视思维”，看到震撼性的、革命性的、催化性的“未来已来”。

摈弃科研管理“短视思维”，关键在于制度创新。思路决定出路，思维决定思路。走出“用时越少越好，花钱越少越好”的误区，推崇“花得值”，释放创新驱动最高性价比，变“现在决定未来”为“未来决定现在”，激励和引领科研“钻厚木板”，科技高原之上必将竖起更多高峰。

《人民日报》2016.12.30文/刘根生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向社会公布《全民阅读“十三五”时期发展规划》，提出“十三五”时期我国将推出约3000种重点主题出版物，全国将推荐3000家“书香之家”、500个“书香之村（社区）”等，为打造“书香社会”提供了量化指标。量化要求是抓落实的重要方法，但关键要看数字背后有多少干货。

书香社会不能单靠数字堆砌

我国自古就有“耕读传家”的传统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公共文化服务更应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阅读需求为准则，带动全民阅读的氛围，让读书涵养我们民族的文化气质和自信。

不容回避的是，在推动全民阅读过程中，一些地方提供的文化产品与百姓需求错位现象屡见不鲜。比如，一些地方的文化下乡常年“换汤不换药”，无非是几部旧戏、几场旧电影；一些农家书屋提供的书籍不对群众的路子，西北旱区摆放的是水稻种植书，供需南辕北辙。文化服务与群众需求相脱节，必然导致麻将桌热闹闹，图书屋门可罗雀的景象。

文化供给不接地气，根由是形式主义问题。比如建农家书屋、办文化下乡等项目，一些地方单纯凑数量，不断“吹政绩”，应付上级考核，更有甚者，一些公共文化项目还成了一些人发财的“好机会”。

推动全民阅读，必须祛除形式主义。一方面，相关部门应从群众最现实的文化需求出发，在优秀图书出版、合理配置图书资源、改善阅读条件等硬件上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，另一方面要多方营造全民阅读的浓郁氛围，让阅读成为点亮生活的一盏明灯。

新华社2016.12.30文/董建国

760亿元外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

最新发布的《2016中国外卖O2O行业洞察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6年6月，我国外卖用户已达1.5亿人次。行业统计数据显示，2015年网络外卖市场规模达581亿元，今年有望超过760亿元。

小小一份外卖，可以看出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。对于快节奏工作生活的城市工薪阶层来说，吃一顿午饭，把外卖送到办公室里，显然比去食堂、去饭馆排队就餐更省时、更高效。

除了工作日外卖火爆，在闲暇的节假日里外卖同样火爆，其背后的原因，则是家庭结构、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化。家庭规模变小、单身群体扩大，是外卖火爆的重要原因。

在传统社会里，中餐承载着许多社会文化。比如，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同样的饭菜，意味着分享、团圆和天伦之乐。就餐的规矩礼仪、菜肴的烹饪和食用的种种讲究，都具有丰富深刻的

文化内涵。对许多人来说，“妈妈在厨房里烧饭的身影”以及“妈妈烧的饭菜的味道”，都是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
传统社会里，中餐承载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正在慢慢流逝。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，吃饭就是吃饭，那些附着于食物、烹饪和进食之上的种种文化意义，已变得越来越隔阂，越来越矫情。

迅速扩张的外卖业务，为人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生活便捷，也使一些传统文化的热心人扼腕叹息，感慨那种精致的、富于仪式感和情感内涵的家庭生活，被简单粗暴的一份份外卖冲击得七零八落。

然而，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设想没有外卖的生活。承认外卖的作用，接受外卖的现实，在这个基础上重塑生活的品位，赋予生活新的内涵，比束手无策地感叹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更有意义。

《解放日报》2016.12.30文/封寿炎

虚拟现实促使人们与原有生活方式决裂

2016年初，我收到了美国朋友寄给我的Google Cardboard。那是一款结构简单、造价低廉的VR头显。戴上了这个看上去略显粗糙的小家伙，我获得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虚拟现实体验：浸入式地观看了《纽约时报》于其网站和手机应用上推出的第一条VR新闻《流离失所》。这条新闻给我留下的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眩晕，其次则是迷惑。

如今，全国VR硬件市场规模在一年中以几何级速度蹿升至逾20亿元，涉足VR技术的创业公司及相关领域公司则达数百家。

对于文化的观察者来说，搞清楚“虚拟”出来的现实和本意的“现实”之间究竟关系如何，恐怕已成为当务之急。对于所有对虚拟现实技术有浓厚兴趣并坚信其将改变社会文化生态



的人而言，“虚拟”正在改变界定人类文化价值与形态更本质的东西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中国人在这种本应令人措手不及的技术与文化变动中，似乎显得格外兴奋。不但2016年全球在虚拟现实领域的总投资中有超过一半来自中国，而且中国人对虚拟现实技术及设备的兴趣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。这样的现象可以用“中国人对新技术更为热衷”这样简单的逻辑

来解释吗？

作为一个过去一年中在欧洲生活了大半年、在中国生活了小半年的中国人，我的体验是：中国人似乎更容易适应原有逻辑被破坏掉的新生活方式，也似乎更容易义无反顾、毫无惋惜地与原有的生活方式决裂。这仿佛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趋势相互博弈的情境下，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心态。所以，就如虚拟现实技术“虚拟”出来的那个“现实”一样，虚拟现实给人的心态带来的冲击，也成了一种被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幻象。面对那些或许将改写生命与生活的本质的东西，人类一味以审美的方式去享受其带来的眩晕感和魔幻感，这恐怕是比技术本身更令人惊惧的现象吧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2016.12.30文/常江

对银行提出公共性就需要回到银行的“根”和“本”上来。在现有金融体系中，五大行都是国有银行，而且很多城市商行也是国有资本控股银行。这已然决定了这些银行应该承担一定的公共性，努力提供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。

不少银行在市场中只考虑了商业性，忽视甚至放弃了公共性。特别是作为国有银行的五大行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榜样作用，这才是现在银行出现排队难的根本原因。年初，央行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》，要求银行网点需有必要的缓解、避免客户排长队的功能设施和工作措施。只是很多银行落实得并不好。

很多银行忘记了自己是国有银行，或者国有资本控股的身份。正是从这一意义上，我们认为银行排队难的实质是忘本，眼里只有商业性而没有公共性。这也启示我们，要解决银行排队难，更要解决理念问题。

《法制日报》2016.12.30文/毛建国